

科特迪瓦民族和解进程探究^{*}

孟 瑾

内容提要 2010—2011 年选举危机结束后，科特迪瓦开启了民族和解进程。长年的政治军事危机隐藏着深层的历史、经济、社会根源。种植园经济的不可持续性造成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博瓦尼时期实现的经济增长和专制统治暂时抑制了社会矛盾的爆发。后博瓦尼时期，长期积攒的社会矛盾激化，使科特迪瓦社会走向分裂。政治领导人、国家机构、社会组织等不同性质的行为主体参与到民族和解进程中。民族和解因受政治立场、个人利益等因素局限而面临诸多阻力和困难。瓦塔拉政府以经济发展促进民族和解的政策难以弥合多年冲突造成的社会裂痕。只有在弥合族群间或政治利益集团间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结构性改革，构建统一的身份认同基础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和解。

关键词 民族和解 种植园经济 族群冲突 对话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作者简介 孟瑾，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101）。

科特迪瓦拥有 60 多个部族，分为四大族系：阿肯族系、克鲁族系、曼迪族系和沃尔特族系。由于殖民瓜分和统治，这些民族多为跨界民族。^①殖民时期发展的种植园经济不仅使科特迪瓦本地人口向种植园集中的地区流动，而且吸引着大量西非其他地区的人员流入科特迪瓦，形成了土著居民、本国移民与国际移民杂居的局面。1960 年独立后，在“国父”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和平、稳定、对话、发展”政策引领下，科特迪瓦经历了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中国‘和平理念’的内涵及其在西非法语国家中的实践”（项目号：2020YQNQD00127）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中国非洲学刊》编辑部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① 参见刘伟才：《“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与非洲国家冲突——以科特迪瓦为中心》，《世界民族》2012 年第 6 期，第 49—55 页。

经济发展较快、政治相对稳定的 20 年，被誉为“西非橱窗”。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土著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关系日益紧张，地域－族群观念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在 90 年代实行的多党制背景下，政治利益集团利用“土著话语”排挤敌对势力，使族群矛盾全面政治化。^① 经历了 1999 年和 2002 年两次军事政变后，北方由叛军控制，科特迪瓦形成一分为二的局面。2010 年举行总统选举，两大政治军事阵营由于对选举结果持有争议而发生对抗。在联合国和法国的军事介入下，确立了阿拉萨内·瓦塔拉 (Alassane Ouattara) 领导的国家政权，科特迪瓦开始向和平进程过渡。但是长年危机使国家各方面显现出脆弱性，科特迪瓦至今仍处于“非战非和”状态。^② 为弥合社会裂痕、促进社会融合，民族和解是建设和平的必要手段和重要方面。

本文将以科特迪瓦民族和解进程的方式和路径为中心，在分析科特迪瓦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剖析民族和解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文章认为族群、地域等身份问题为理解科特迪瓦冲突提供了分析视角，但是科特迪瓦冲突是长期积攒的社会经济矛盾的集中爆发，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或者南方与北方之间的身份冲突。因此，应弥合族群间或政治利益集团间关系，并通过多维度的政治经济改革，消除冲突根源，以促进民族和解。

冲突的根源与演变

1999 年第一次军事政变之后，科特迪瓦陷入长期的政治军事危机。军事对抗和政权争夺背后隐藏着深层的历史根源。以开发土地资源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具有不可持续性。博瓦尼时期短暂的经济繁荣掩盖了土著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矛盾。以专制制度为保障的庇护网络因强人博瓦尼的离世而难以维系，族群矛盾最终在政治军事层面爆发。

（一）殖民时期种植园经济的发展与族群认同的强化

在法国殖民者入侵前，科特迪瓦长期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经济结构以生产资料归氏族公社的公有制为主。1893 年，科特迪瓦沦为法国殖民地，而后归驻达喀尔的法属西非大总督管辖。法国殖民政府大面积开发可可和咖啡种

① 参见李鹏涛、黄金宽《当代非洲民族国家土著话语的兴起》，《世界民族》2013 年第 4 期，第 22—29 页；庄晨燕《科特迪瓦的多党民族与族群冲突》，《西亚非洲》2015 年第 5 期，第 144—160 页。

② Mike McGovern, *Making War in Côte d'Ivoi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植区，并且强迫科特迪瓦人从事可可、咖啡种植，改变了科特迪瓦的经济社会结构及发展轨迹。^①

为更有效地开发和管理殖民地，兼有殖民官员与民族志学家双重身份的莫里斯·德拉福斯（Maurice Delafosse）将科特迪瓦分为六大语区，以六大语区为基础的族群体系成为殖民统治者管理殖民地的重要参考。^② 语区划分以维护殖民统治利益为导向，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③ 如在东南部生活的阿尼族人由于从事橡胶和可可种植而在殖民统治中享有一定的自主性。迪乌拉族人因善于从事贸易活动并且拥有较完备的组织体系，被法国殖民者认为是“文明的使者”。而在西部丛林里生活的贝特族人由于顽强抵抗殖民侵略而被认为生性野蛮好战，被迫成为种植园经济中的劳动力。

在种植园经济背景下，对土地资源和劳动力的需求成为人口流动的直接驱动力。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劳动力从科特迪瓦西部、中部、北部地区向阿尼族人为种植园主的东南部地区转移。四五十年代，随着种植园经济不断发展，农业用地逐渐向人口较为稀少且适宜可可、咖啡种植的西部及西南部推进，科特迪瓦经济中心也随之开始由东南部向西部及西南部转移。大批中部地区巴乌莱族人和北部地区的玛琳凯族人、迪乌拉族人、塞努夫族人等移居在此。^④ 同时，法国殖民者有组织地将上沃尔特地区（今布基纳法索）的莫西族人输送到科特迪瓦，来满足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些外来移民向当地提供劳动力的同时逐渐成为种植园主。其中，巴乌莱族人通过从事种植劳作而发展壮大，取代阿尼族成为最大的种植园主群体。

① Patrick Braibant, «L'administration coloniale et le profit commercial en Côte d'Ivoire pendant la crise de 1930»,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1976, No. 232-233, pp. 557-574.
Jean-Pierre Chauveau et Jean-Pierre Dozon, «Colonisation, économie de plantation et société civile en Côte d'Ivoire», *Cahier ORSTOM Série sciences humaines*, 1985, Vol. XXI, No. 1, pp. 63-80.

② Maurice Delafosse, *Vocabulaire comparatif de plus de soixante langues ou dialectes parlés à la Côte d'Ivoire et dans les régions limitrophes*, Paris, Leroux, 1904. 在该体系基础上，现今的科特迪瓦族群划分体系稍有调整。科特迪瓦的部族大致可分为四个大的族系，细分为 60 多个部族。这四大族系分别为：阿肯族系（最大族系，包括中部的巴乌莱族、东部边境地区的阿尼族、阿克隆族以及沿海潟湖地区的埃布里族、恩齐马族、阿茹克鲁族等）、曼迪族系（西北地区的马林凯族、邦巴拉族、迪乌拉族、富拉族以及中西部山区的丹族等）、克鲁族系（西南部地区贝特族、格雷族、克鲁族等）、古尔族系又称沃尔特族系（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塞努弗族、洛比族等）。

③ Jean-Pierre Chauveau et Jean-Pierre Dozon, «Ethnies et Etat en Côte d'Ivoire»,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1988, Vol. 5, No. 38, pp. 732-747.

④ Jean-Pierre Chauveau, «Question foncière et construction nationale en Côte d'Ivoire, les enjeux silencieux d'un coup d'Etat», *Politique africaine*, 2000, No. 78, pp. 94-125.

外来人口对土地的需求使本地人感到不安,后者纷纷成立社会组织来维护本族利益。阿尼族人成立的“科特迪瓦维护本地人利益组织”(Association de défense des intérêts des autochtones de Côte d'Ivoire, ADIACI),是最早的以维护本族利益为宗旨的社会组织,它试图通过习俗法禁止向巴乌莱族人或者迪乌拉族人^①转让土地。其他部族(贝特族、埃布里族、沃尔特族等)也成立了以族群为单位的^②社会组织。各部族通过成立社会组织维护本族利益,无疑再次强化了族群观念,使其成为政治经济利益诉求的表达工具。

(二) 博瓦尼时期实现“经济奇迹”的同时埋下族群冲突隐患

20世纪40年代,科特迪瓦人所有的种植园占比大大超过了由欧洲人开发的种植园。为了进一步激发科特迪瓦人从事种植业的热情,实现更大的经济利益,殖民政府行政长官安德烈·拉特里尔(André Latrille)于1944年允许巴乌莱族裔种植园主博瓦尼创建非洲农业工会(Syndicat Agricole Africain, SAA)。在博瓦尼的推动下,《土著法》和强制劳动制度被废除,劳动力实现了自由化,满足了本土种植园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促进了本土种植园经济的发展。^③

1945年,为缓和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法兰西政府实行殖民制度改革,赋予殖民地选派国民议会议员的权利,博瓦尼作为候选人最终当选。博瓦尼声誉大振,非洲农业工会的地位随之得到提升。1946年,博瓦尼在非洲农业工会的基础上,创建了科特迪瓦民主党(Parti démocratique de la Côte d'Ivoire, PDCI)^④。1960年,在博瓦尼的领导下科特迪瓦实现独立,成立科特迪瓦共和国。博瓦尼政府政治上实行一党专制,经济上通过吸引外来人口扩大种植园经济规模。20世纪70年代,得力的政治经济政策刺激了科特迪瓦经济发展,可可、咖啡市价上扬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科特迪瓦经历了经济繁荣时期,成为当时西非地区最发达的国家,一时被称为“经济奇迹”。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博瓦尼政府利用对社会财富(即土地使用权及出口农产品收益)的再分配来支撑和扩

① 迪乌拉族人在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经常被用来泛指马里、布基纳法索、几内亚以及科特迪瓦地区的北方部族。

② Marshall - Fratan Ruth, "The War of 'Who is Who': Autochthony, Nationalism, and Citizenship in the Ivoirian Crisis,"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49, No. 2, 2006, pp. 9 - 43.

③ Jean - Pierre Chauveau et Jean - Pierre Dozon, « Ethnies et Etat en Côte d'Ivoire »,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1988, No. 38, Vol. 5, pp. 732 - 747.

④ Jean - Noël Loucou, « Aux origines du parti démocratique de la Côte d'Ivoire », *Annales de l'Université d'Abidjan*, Série 1, V. Histoire, 1977.

大其庇护网络，汲取政治合法性。^①与此同时，博瓦尼政府通过充裕的财政收入促进公共事业发展，如大范围改善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医疗，使广大民众得以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保障了社会基本稳定。

博瓦尼政府认识到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是种植园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一方面通过“土地属于开发者”政策进一步促使中部的巴乌莱族人以及北方邻国的迪乌拉族人大量涌向贝特族、格雷族、克鲁族占多数的西部地区，另一方面借助泛非主义思想和传统监护制度鼓励或强迫西部地区的“本地人”接纳外来移民。^②此外，为了使外国移民拥有归属感，国民议会于 1980 年通过选举法，赋予西部非洲其他国家的移民选举权。这些政策将本国移民和外国移民吸纳到科特迪瓦经济、政治建设和社会生活中。但是，随着外来人拥有越来越多的土地支配权和物质财富，他们与本地监护者之间的从属关系开始松散甚至出现调换，双方建立的传统契约形式难以维系。^③

尽管经济增长使社会各阶层普遍分享到发展红利，一时掩盖了科特迪瓦族群间以及科特迪瓦人与外国移民之间的矛盾，但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科特迪瓦经济发展出现下滑，国家财政收入锐减，庞大的庇护网络和社会平衡难以维系，政治、社会局势随之恶化。另外，工业占地面积增加和可耕种面积减少加剧了社会关系紧张。在西部以及西南部等外来人口聚集的地区，土著居民与本国移民、外国移民之间的冲突频发。

（三）后博瓦尼时期围绕“科特迪瓦性”族群矛盾全面政治化

以土地扩张为前提条件的种植园经济是不可持续的。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和国际经济形势下滑造成外来劳动力与本地民众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张。在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科特迪瓦于 1990 年开始实施多党制，社会矛盾在政治层面爆发。1993 年博瓦尼去世后，民主党成员国民议会议长亨利·科南·贝迪埃（Henri Konan Bédié）继任总统。总理瓦塔拉与从科特迪瓦民主党内脱离出来的

① Sylla Lanciné, « Genèse et fonctionnement de l'Etat clientéliste en Côte d'Ivoire »,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Vol. 26, No. 1, pp. 29 - 57.

② 监护制度是协调土著居民与外来人口关系的传统方式。在本地人的监护下，外来移民享有部分土地的开发使用权并须将一部分收成上缴。监护人则为外地人提供住房，甚至帮助其娶妻，这使得外地人成为本地人家庭、社群中的一员，两者之间在地主与佃农的关系之外建立了仿“亲缘关系”。Gaouli Bi Anicet Patrice, *Tutorat et conflits fonciers ruraux dans l'ouest ivoirien*, Dakar: CODESRIA, 2012BFQ.

③ Jean-Pierre Chauveau et Samuel Koffi Bobo, « Crise foncière, crise de la ruralité et relations entre les autochtones et migrants sahéliens en Côte d'Ivoire forestière », *Outre - Terre*, 2005, Vol. 2, No. 11, pp. 247 - 264.

革新派结成联盟，成立共和党人联盟（Rassemblement des républicains, RDR），以参加 1995 年总统大选。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氛围中，对“科特迪瓦性”的重新阐释使原有的土地问题、族群问题政治化。“科特迪瓦性”一词可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最初指生活在科特迪瓦所有居民共有的文化认同属性。^①虽然这一概念最初没有任何排他倾向，但是该词在博瓦尼政治遗产之争的背景下很快成为利益争夺的政治工具，使潜在的冲突公开化。贝迪埃利用“科特迪瓦性”为修改选举法创造条件。1994 年 12 月通过的 94-642 号法案第 49 条规定：总统候选人必须出生在科特迪瓦，父亲和母亲也都出生在科特迪瓦，从来没有放弃过科特迪瓦国籍，并且在选举前五年连续在科特迪瓦居住。按照修改后的选举法，共和党人联盟领导人瓦塔拉由于其父为布基纳法索人而不能参加 1995 年总统选举，贝迪埃最终以绝对多数票当选。这一法案的出台使与瓦塔拉有相近身份符号（即来自北方信仰伊斯兰教的迪乌拉族人）的社会群体产生了蒙受不公、羞辱的心理，社会关系进一步走向分裂。

此外，为解决地权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贝迪埃政府起草了《农村地权法》98-750 号法案，交由国民议会于 1998 年 12 月 23 日表决通过成为法律。该法案借助“科特迪瓦性”将土地所有权与科特迪瓦身份相关联，规定非科特迪瓦国籍的土地使用者不再是土地所有者，而仅是农业劳动力或者佃农。科特迪瓦国籍成为享有地权的前提，如何定义“科特迪瓦人”成为关键问题。该法案不但没能缓和原有的紧张关系，反而使冲突由族群间冲突扩大为科特迪瓦人与外籍人员之间的矛盾。^②

外籍人员，特别是布基纳法索人以及具有相似宗教文化属性的北方部族成为权力争夺的牺牲品，产生了社群自闭情绪。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的《北方宪章》成为与“科特迪瓦性”对应的另一族群—地域性概念，反映了北方部族被排挤的受害者心理。2002 年《北方宪章》被再次修订，号召各阶层的北方人联合起来为建立团结强大的“大北方”而努力。^③

1999 年 9 月，随着 2000 年总统大选临近，瓦塔拉的国籍问题再次被质疑，

① Jean - Pierre Dozon, « La Côte d'Ivoire au péril de l'ivoirité, Genèse d'un coup d'Etat », *Afrique contemporaine*, janvier - mars 2000, No. 193, pp. 13 - 23.

② Alfred Babo et Yvan Droz, « Conflits fonciers, de l'ethnie à la nation: rapports interethniques et 'ivoirité' dans le sud - ouest de la Côte d'Ivoire », *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 2008, No. 192, pp. 741 - 764.

③ Alfred Babo, « Conflits fonciers, ethnicité politique et guerre en Côte d'Ivoire », *Alternatives Sud*, 2010, Vol. 17, pp. 95 - 118.

引发了共和党人联盟的游行示威，其主要领导成员被捕。1999 年 12 月 23 日，科特迪瓦参加联合国中非维和行动的士兵因政府拖欠军饷而发动军事政变，贝迪埃政权被推翻，罗贝尔·盖伊将军（Robert Guéi）成立军人过渡政权。尽管盖伊政权承诺将铲除基于“科特迪瓦性”的排外思想，但是 2000 年总统大选时，宪法法院再次取消了瓦塔拉的候选人资格，科特迪瓦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 Ivoirien, FPI）领导人洛朗·巴博（Laurent Gbagbo）当选总统。2002 年 9 月 19 日，为释放对于政府歧视北方人政策的不满情绪，科特迪瓦爱国运动（Mouvement patriotique de Côte d'Ivoire）发动政变。尽管政变未遂，但是北方被叛军控制，造成南北分治的局面。

2007 年，在布基纳法索总统布莱斯·孔波雷（Blaise Compaoré）的调解下，巴博政府与北方叛军达成和平协议，实现南北统一。然而，短暂脆弱的和平局面没能持久。2010 年 4 月，科特迪瓦再次举行大选，选举委员会宣布瓦塔拉获胜，宪法委员会则宣布巴博获胜，瓦塔拉与巴博领导的两大政治军事阵营发生对抗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政治军事对抗再次引发西部地区本地人（巴博支持者）与北方移民（瓦塔拉支持者）之间的冲突，造成至少 50 万人流离失所。^① 胶着的安全态势使法国和联合国派出部队介入。2011 年 4 月，支持瓦塔拉的军队“新力量”占领首都阿比让，巴博被移交至国际刑事法庭。5 月，瓦塔拉正式就任总统，科特迪瓦开始向和平过渡。

多年的政治军事危机使国家各个方面显现出脆弱性：经济发展停滞，公共服务体系遭到破坏，民众安全感缺失。庆幸的是，瓦塔拉政府的经济重振计划使科特迪瓦逐渐走出战争泥沼，并因此赢得了大部分民众和国际社会的认可。2015 年，瓦塔拉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以 83.7% 的得票率胜出，得以继任。2020 年 10 月，因指定候选人阿马杜·戈恩·库利巴利（Amadou Gon Coulibaly）突然去世，瓦塔拉再次参加总统大选，并最终 94.3% 的得票率胜选。以贝迪埃为代表的反对派于 11 月成立全国过渡委员会。尽管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瓦塔拉与贝迪埃暂时达成和解，但是政治分歧和社会裂痕依旧存在。瓦塔拉第三次当选科特迪瓦总统再次引发社群间的冲突和暴力对抗，造成近百人死亡。^② 冲突多集中于社群关系紧张的中部和中东部地区，再次反映出社会矛盾之尖锐，

① « Côte d'Ivoire: la guerre civile a déjà commencé » [En ligne], Jeuneafrique, 3 juillet 2012, <https://www.jeuneafrique.com/181837/politique/c-te-d-ivoire-la-guerre-civile-a-d-j-commenc> [2020-08-16].

② « Pourquoi le Centre s'est embrasé » [En ligne], Jeuneafrique, 10 décembre 2020, <https://www.jeuneafrique.com/1088322/politique/cote-divoire-pourquoi-le-centre-sest-embrase> [2021-01-08].

民族和解任务之重大。

民族和解机制与成效

民族和解旨在通过重建真相和公平正义来平复愈合战争伤痕，是社会从分裂的过去走向共同未来的过程。^① 多年的军事纷争和政治动荡不仅加深了科特迪瓦社会裂痕，而且破坏了个体之间的信任基础。政治派别、族群归属、地域概念等身份标识在冲突过程中被多次强调和深化，对社会契约的重建造成障碍，导致社会进一步走向割裂。为巩固和平基础、预防冲突复燃，民族和解是科特迪瓦政府和社会面临的迫切又艰巨的任务。为了更好地认识民族和解进程，本文根据参与民族和解进程主体的不同性质，将民族和解进程解构为上、中、下层。

（一）以政治对话、司法诉讼为主的上层和解

这一层级涉及的主要群体是高级政要和军队领导人，包括政府和反对派的主要代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建立政治对话、达成共识是民族和解的第一步。另外，对参与冲突的主要负责人提出司法诉讼，维护司法正义，是调整权力关系、赢得民众信任的重要前提。

2010—2011 年选举危机的结束是以一方的选举和军事胜利为标志，没有政治谈判做基础。^② 外部势力（法国和联合国）介入最终使对立双方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倾斜。因此，建立政治对话是实现民族和解的前提。在国际社会的敦促下，瓦塔拉政府和反对党成立了政治和解机制——永久对话框架（Cadre Permanent de Dialogue, CPD）。这一机制旨在搭建为改善政府与反对派间关系、巩固两者间信任提供交流、研讨、建议及行动的平台。^③ 2012 年 4 月以来，各阵营领导人在该框架内展开对话。然而，对话因缺乏共识基础而收效甚微。^④ 反对派主要政党，

① « La réconciliation après un conflit violent », International IDE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2004. Ho - Won Jeong, *Peacebuilding in Postconflict Societies: Strategy and Process*,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5, p. 156.

② Giulia Piccolino, « Rhétorique de la cohésion sociale et paradoxes de la 'paix par le bas' en Côte d'Ivoire », *Politique africaine*, 2017, No. 148, pp. 49 - 68.

③ « Côte d'Ivoire: un séminaire gouvernement - opposition annoncé pour un climat politique apaisé » [En ligne], abidjan.net, 21 septembre 2013, <http://news.abidjan.net/h/473479.html> [2020 - 03 - 09].

④ « Côte d'Ivoire: faire baisser la pression », *Rapport Afrique* N°193,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6 novembre 2012.

巴博领导的科特迪瓦人民阵线，将释放巴博及其支持者作为参与对话的前提条件。而瓦塔拉政府认为追究司法责任是民族和解的前提，坚持对 2002 年政治军事危机以来侵犯人权的行为予以法律制裁。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成为实现政治对话的主要障碍。

在司法问题上，瓦塔拉政府经常被国际社会和反对派批评实行双重标准。虽然瓦塔拉上台时承诺致力于实现司法公正，但在实际操作中，他被指控利用权力偏袒曾支持自己上台的利益群体。尽管支持瓦塔拉的军事力量在选举危机中同样存在严重的施暴行为，但是受法律制裁的大部分为巴博阵营成员。这使公众舆论认为只存在“胜利者掌控中的司法”。^①

2018 年 8 月，瓦塔拉政府决定赦免约 800 名曾参与暴力冲突的犯罪人员，其中包括前第一夫人、科特迪瓦人民阵线副主席西蒙娜·巴博（Simone Gbagbo），此举是瓦塔拉政府对于实现民族和解释放的积极信号。然而，有分析称释放西蒙娜是为了分化人民阵线的内部团结，进而为执政党赢得 2020 年总统选举排除障碍。^② 2019 年 1 月，国际刑事法庭由于缺少证据宣布被指控犯危害人类罪的巴博无罪。但是，由于面临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再次指控，巴博目前仍被滞留在比利时，其人身自由受到监控和限制。^③ 巴博的拥护者把释放巴博作为实现真正和解的前提条件，其个人处境直接左右着拥护者的和解意愿和谈判立场，影响社会走向分裂还是融合。

上层领导人的态度和立场左右着舆论导向，司法审判的进度和公平性影响着和解进程。上层领导人之间的和解虽然有一定的影响力，暂时缓解紧张局势，但该层面的和解通常以维护或争夺政权为目标，不具备广泛的代表性，不能代表分裂的民众利益和立场。

（二）以对话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为代表的中层和解

中层和解的参与者主要包括享有社会威望的个体或者领袖，他们通常在教

① « Côte d'Ivoire: la réconciliation impossible? » [En ligne], Jeuneafrique, 3 juillet 2012, <https://www.jeuneafrique.com/140936/politique/c-te-d-ivoire-la-r-conciliation-impossible/> [2020-03-24]. Maja Bovcon, "The Progress in Establishing the Rule of Law in Côte d'Ivoire under Ouattara's Presidency,"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 48, No. 2, 2014, pp. 185-202.

② « Politique nationale: Simone Gbagbo mélange tous les calculs; Que va faire le Fpi? » [En ligne], linfofodrome, 11 août 2018, <http://www.linfofodrome.com/vie-politique/41030-politique-nationale-simone-gbagbo-melange-tous-les-calculs-que-va-faire-le-fpi> [2020-02-05].

③ Côte d'Ivoire Evénements de 2019, Human Right Watch, <https://www.hrw.org/fr/world-report/2020/country-chapters/336817> [2020-02-19].

育、商业、农业或卫生领域就职，或者是宗教团体、学术社团的代表。这一层级涉及的群体人数较多、身份也更加多样。该群体通过工作坊、培训、委员会的形式来影响政治决策，恢复民众对于和解的信心与能力，从而实现持久和平。他们不同于追求短期政治利益的高层领导人，对社会问题和底层民众的诉求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本文以科特迪瓦对话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为例，来重点分析此类机构如何在和解进程中发挥作用。

参照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模式，瓦塔拉于2011年7月在多名“元老会”(The elders)^①成员的见证下成立了对话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寻找真相、建立对话、组织受害者听证会来促进民族和解与社会团结。该委员会财政上具有独立性，是在社会向和平过渡阶段设立的准司法性机构。换言之，委员会可以提审任何人，其提出的建议有可能被刑事法庭采纳，但不具备司法效力。中央委员会成员由公民社会、氏族首领、宗教领袖、妇女和青年代表以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代表组成。为了使委员会行动更加贴近地方的现实情况，设置37个地方委员会。^②委员会各项决议由全体代表大会商议决定，必要时组织投票。

委员会的职责包括：向刑事法庭、政府、政党提出建议；通过地方工作组收集受害者提供的证据，听取民众诉求和想法，鼓励其走向民族和解，避免再次发生暴力事件；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角度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危机演变进程及冲突的结构性根源进行全景式分析和研究。委员会一方面要向中央政府提交报告，另一方面要通过去中心化结构帮助民众加深对民族和解的认识。因此，委员会在民众和政府之间起衔接作用。

委员会追求实现兼顾和平与公正的“转型正义”旨在矫正前期政府罪行与重新融合受害者与加害者双方之间寻求平衡，并试图建立一个较为和平、民主与正义的未来。^③转型正义通过公正的司法对加害者实施惩罚，同时避免进一步激发受害方的仇恨，使冲突各方对过去建立共识，重建信任，在不深化仇恨的基础上为和平创造条件。委员会将战争中的抢掠暴力行为公之于众的同时，重建对过

① 元老会是一个老年政治家、和平活动家和人权倡导者等公众人物的政治组织，由纳尔逊·曼德拉在2007年召集建立。见证科特迪瓦对话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立的元老会成员有：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前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戴斯蒙·图图(Desmond Tutu)以及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

② 在31个大区设立31个地方委员会，首都阿比让设立6个地方委员会。

③ Paige Arthur, "How 'Transitions' Reshaped Human Rights: A Conceptual History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Human Rights Quarterly*, No. 31, 2009, p. 331. 转引自青觉、朱鹏飞《从宽恕到宽容：后冲突时代南非社会和解与转型正义之反思》，《世界民族》2009年第1期，第15页。

去的集体记忆，是转型正义的有效工具。^① “如果加害者承认其过错行为，那么受害者应予以一定的原谅。”^② 转型正义具有修复和预防双重功效，有助于预防将来战争再次发生。

然而事实上，由于种种困难，旨在重建对他者、对集体、对权力信任的转型正义未能在科特迪瓦实现。在对话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任期结束时，社会融合的预期目标没有完成。^③ 由于受政治势力干扰，对话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缺乏公信力，未能有效调动民众积极性。委员会主席并非选举产生，而是由总统任命，其代表性受到质疑。委员会主席由前国家总理、科特迪瓦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夏尔·科南·班尼（Charles Konan Banny）担任，其政治身份以及工作能力遭到民众以及国际机构合作者的批评。^④ 地方委员会没有足够的自主能力，工作流于形式。另外，委员会提供的服务是有偿的，一方面给处于困境的民众增添经济压力，另一方面由于案件数目众多，人们不得不利用关系网使自己递交的材料尽早得到处理，这为腐败开辟了新渠道。许多民众由于需要支付较高费用（包括正常的服务费以及给工作人员额外的报酬）而放弃了向对话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寻求帮助或赔偿。

基于以上问题，对话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没有完成预期目标。在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公开庭讯后，委员会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宣布终止使命，并于 2014 年 12 月 15 日向总统提交了报告。由于瓦塔拉政府不接受报告中对巴博支持者在 2010 年选举中立场的分析，报告两年后才公开于众。2015 年 3 月，对话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被全国和解与受害者赔偿委员会（Commission nationale pour la réconciliation et l'indemnisation des victimes, CONARIV）取代，而后者的政策实施力度和效果也很不尽人意，于 2016 年 12 月停止运行，2017 年 7 月被社会团结与妇女儿童部接管。^⑤

① Kora Andrieu, *La justice transitionnelle: de l'Afrique du Sud au Rwanda*, Paris, Gallimard, 2012, p. 373.

② 笔者对科特迪瓦对话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秘书长伊拉（Jean Yra）的采访。阿比让，2014 年 7 月 22 日。

③ Daniel Lopez, « La Commission Dialogue Vérité et Réconciliation en Côte d'Ivoire, la réconciliation n'a pas eu lieu », *Note d'analyse du Groupe de recherche et d'information sur la paix et la sécurité*, 2015.

④ 在笔者对科特迪瓦危机受害者组织联合会（Confédération des organisations de victimes de la crise ivoirienne）的访谈中，该组织负责人批评委员会主席班尼将人力和财力资源集中于个人手中，利用委员会主席职位增加其政治和社会影响力。阿比让，2014 年 7 月 20 日。

⑤ André Silver Konan, « Côte d'Ivoire: la réconciliation en souffrance » [En ligne], Jeuneafrique, 3 mai 2018, <https://www.jeuneafrique.com/mag/562610/politique/tribune-cote-divoire-la-reconciliation-en-souffrance/> [2020-03-20].

(三) 以民间社会组织为主体的下层和解

下层和解的主要参与者是社会的“草根”阶层，通常是当地的非政府组织成员。他们扎根于地方，更了解民众疾苦，对民众的恐惧心理更能感同身受。借助对地方现实问题的深入了解，他们更容易帮助不同族群、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建立对话。

冲突虽然结束，但积攒多年的失落感和仇恨情绪继续影响着社会行为，并固化成一定的思维模式。在一定情境下，这种情绪会引发社群间的相互攻击，深化政治立场分歧。为了使和平根植于社群基层，实现自下而上的和解十分重要。民间社会组织在倡导和平文化、维护司法公正、保护弱势群体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如非政府组织“博爱”（Fraternité）在科特迪瓦民众中倡导超越族群差异、实现对话包容，非政府组织“维护人权行动”敦促政府追究加害者法律责任、维护受害者权利。^①在此，本文以在司法正义领域做出典型贡献的非政府组织“重生”为例，分析地方层级是如何自发地参与到和解进程中的。

“重生”组织成立于2013年，其宗旨是实现“恢复性正义”，即通过修复社群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使社会恢复到理想状态。其组织成员多为律师、法学专业毕业生或教授等具有专业知识的志愿者。该组织一方面对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和心理支持，使其乐于为社会融合做出努力，帮助社会营造和解文化；另一方面通过调查和统计工作了解群众实际需求。该组织所追求的“恢复性正义”是在加拿大“恢复性正义”服务中心创始人特雷莎·维莱特（Thérèse de Villette）^②帮助下实施的。为了使这一方法理念适用于科特迪瓦本国国情和本土社会价值观，“重生”组织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工作。

“重生”组织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在科特迪瓦最大的监狱阿比让拘留与管教所开展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直接对话，以跨越对彼此的心理壁垒，还原恢复真相。在对话过程中，志愿者注重保护活动参与者的隐私以及活动的私密性。“为了让他们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经历，我们特意掩盖了参与者的身份。”^③

① « Tanoh Blihot, président de l'ONG Côte d'Ivoire Fraternité, appelle à la tolérance et au pardon » [En ligne], Abidjan. net, 12 mai 2014, <https://news.abidjan.net/h/497072.html> [2020-04-02].
« Action pour la protec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 Peaceinsight, <https://www.peaceinsight.org/conflicts/ivory-coast/peacebuilding-organisations/action-pour-la-protection-des-droits-de-lhomme> [2020-04-02].

② Thérèse de Villette, *Faire justice autrement, le défi des rencontres entre détenus et victimes*, Montréal, Médiaspaul, 2009.

③ 笔者对“重生”组织负责人塞卡（Fabrice Séka）的访谈。阿比让拘留与管教所，2014年7月16日。

尽管如此,该组织的志愿者经常遇到缄口不言的受害者。一方面,由于心理上承受了很大创伤,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词汇描述他们的惨痛经历;另一方面,他们内心有着深深的不安全感,害怕揭露真相危害其人身安全。

“只有真相使我们自由,但真相总是可怕的。”^① 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阐释了真相在重建公正过程中的重要性。真相的重现是实现可持续和平的必要途径,但是真相通常充满复杂性和矛盾性。多年来的政治军事危机使人们长期处于对他人非理性的恐惧心理中。在非常态的社会心理影响下,个体对他人持质疑、警惕、提防的态度,真相的揭露极可能引发新一轮社会冲突。同时,真相的复原依赖于加害者和受害者对自身经历的描述。每个人通过释放自己的行为和话语参与到解放自我的过程中。在科特迪瓦,个体对于事实的阐述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受政治倾向、身份认同以及自身经历等因素的影响。与具有科学性的“历史真相”不同,这种根据个人经历建立的“叙事真相”,是主观的,不是客观唯一的。^② 另外,加害者和受害者很难分辨,甚至一些人具有双重身份。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而否认其攻击者的身份。这些因素增加了基层和解工作的难度。

基层公民组织的活动更接近当地群众,能更好地满足其需求。下层民族和解工作更加细腻,关注微观层面。与此同时,基层社会组织对民族和解机构起监督作用,质疑对话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中立性,批评其脱离群众,是政治家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③ 较于本国政府,当地社会组织更倾向于国际非政府组织,认为从它们那里得到了实质性帮助和指导。但这种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当地社会组织的合作也引发一些质疑,国际非政府组织介入一国和解进程的合法性以及在介入过程中能否保持公平公正立场等问题引发广泛的社会争论。

民族和解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010—2011 年选举危机结束已近十年,科特迪瓦民族和解进程取得了一定进展,社会日趋稳定,经济增长势头良好。然而在北部、西南部地区,小规模冲

① Hannah Arendt, *Responsabilité et jugement*, Paris, Payot, 2005, p. 276.

② Anne-Aël Pöhu et Emmanuel Klimis, *Justices transitionnelles: oser un modèle burundais comment vivre ensemble après un conflit violent*, Bruxelles, Facultés universitaires Saint-Louis, 2013, No. 61, p. 15.

③ 2014 年 7 月 18 日,笔者通过参加科特迪瓦危机受害者组织联合会例行会议了解到,联合会成员普遍认为对话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统治者缓和抚慰民众情绪、应付国际社会舆论压力的工具。

突仍时有发生。虽然冲突规模不大、波及范围有限，但依旧影响着社会安定、扰乱人们正常生活。科特迪瓦民族和解进程仍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

（一）民族和解机制未触及深层结构问题

无论科特迪瓦民族和解进程的切入点是领导人之间、党派之间（上层）还是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中下层），其关注的主要是政治利益集团或者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尽管该层面的和解有助于修复政见分歧、缓和党派矛盾、弥合社会裂痕，但是引发冲突的深层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正如前文所述，科特迪瓦冲突并非纯粹的族与族之间的冲突，而是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根源：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造成的区域间、族群间不平衡；以新父权主义为基础的政治经济资源分配体系的不可持续性；以地域—族群为中心的身份问题为长久积攒的社会经济矛盾提供爆发的出口等等。若结构性矛盾持续存在，被暂时掩藏的社会矛盾有可能在重大关系调整时期（如总统大选时期）被再次激化。调和社群间由于地权问题引发的矛盾，健全司法体系、填补传统司法在土地资源分配问题上出现的漏洞，在民族国家建设基础上形成统一的身份认同……只有这些结构性问题得到解决才能根除社会冲突的根源，真正实现和解。

对话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向政府提交的最终报告中对结构性问题有所提及，瓦塔拉政府也认识到结构性问题的存在并尝试进行改革。瓦塔拉在 2012 年 4 月访问西部地区期间做出了解决地权问题的承诺，但是其改革措施在实践中受到束缚，公平分配土地资源的难题尚未解决。瓦塔拉政府对于土地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身份认同问题采取回避和搁置态度。例如，2016 年出台的新宪法第 12 条规定：只有国家、公共集体和拥有科特迪瓦国籍的自然人可以享有土地所有权。占有、授予、转让土地的行为需要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土地制度被纳入宪法范围，地权受宪法保护。^①新宪法明确了法律在土地管理中的中心地位，期望通过根本法的法律效力深化官员和民众的法律意识，防止相关土地制度或法律被曲解或滥用。然而，该宪法同 1998 年《农村地权法》一样面临着执行中的客观公平性问题。另外，拥有科特迪瓦国籍再次成为享有地权及其他政治权利的关键性问题。在多党选举的政治环境下，土地问题可能继续被政治化，再次成为政治领导人左右民众意愿的工具。

① Ousmane Zina, «Le caillou a-t-il été retiré du soulier de la République? Réconciliation nationale et réformes constitutionnelles en Côte d'Ivoire», *Afrique contemporaine*, 2017, No. 263 - 264, pp. 25 - 39.

(二) 以经济增长促民族和解的政策, 难以转化为社会效益

瓦塔拉总统上台后制定了《2012—2015 年国家发展计划》和《2016—2020 年国家发展计划》, 确立了 2020 年建成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发展目标。根据计划, 科特迪瓦将通过快速持续的增长加速发展步伐, 使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水平, 大幅度减贫, 促进中产阶级的壮大。^① 瓦塔拉政府的经济刺激和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 科特迪瓦成为西非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头国家。2012 年以来, 科特迪瓦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 7% 以上, 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增长速度。2020 年, 受全球范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科特迪瓦经济明显放缓, 但仍实现了 1.8% 的正增长。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提振了国外投资者和国际合作方对科特迪瓦经济市场和社会环境的信心, 提高了瓦塔拉政府的国际形象。

然而, 科特迪瓦经济在宏观层面上的良好表现不能说明国民生活水平得以改善, 数字上的增长没能转化为社会效益, 国内购买力呈下降趋势, 基本生活费用高昂, 使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持续高涨。2016 年 1 月, 电费价格提高了 16%, 引发社会大规模抗议。并且, 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不断拉大。^② 贫困人口比例仅由 2008 年的 48.9% 下降为 2019 年的 46.3%, 这与国家发展计划中的大幅度减贫目标相去甚远。^③ 政府承诺的包容性增长与民众的真实体验形成反差, 损害了国家的公信力, 增加了国家政权的脆弱性和社会不稳定因素。

瓦塔拉政府以经济促和平的政策是对博瓦尼政府经济增长与社会融合相结合的发展战略的继承。博瓦尼时期通过建立和维护庇护网络将资源分配到体系内不同层级的利益相关者, 通过满足基本需求的公共政策使广大民众实现对发展红利的“有限分享”。这一体系得以运转的前提是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以及利益集团的整合性, 也就是说在政治和社会力量无明显分歧的前提下, 经济发展的红利能基本满足再分配的需求。然而, 科特迪瓦在经历了多党制改革和多年的政治军事危机后, 无论是上层领导集团还是下层公民社会都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 瓦塔拉

① « Le plan national de développement 2016 – 2020 » [En ligne], Ministère du plan et du développement, 23 juin 2017, <http://www.plan.gouv.ci/accueil/odd/3> [2020 – 04 – 03].

② Denis Cogneau, Léo Czajka et Kenneth Hounbedji, « Le retour de l'éléphant triomphant? croissance et inégalités de revenu en Côte d'Ivoire (1988 – 2015) », *Afrique contemporaine*, 2017, Vol. 3, No. 263 – 264, pp. 221 – 225.

③ « Côte d'Ivoire: présentation » [En ligne], Banque mondiale, <https://www.banquemondiale.org/fr/country/cotedivoire/overview#2> [2020 – 03 – 23].

政府无法通过重建囊括大多数利益相关者的庇护网络来实现资源再分配。尽管瓦塔拉政府有意识地将发展红利向下层平民倾斜，但是有限的发展红利在渗透到下层公民社会之前已经被接近权力的利益集团吸收，造成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如何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改革，是瓦塔拉政府亟待解决的课题。

（三）国际社会介入科特迪瓦民族和解进程，影响当地民众自主性的发挥

国际组织重视并积极介入科特迪瓦民族和解进程。^① 瓦塔拉政府与国际组织保持着谨慎又复杂的关系。一方面，科特迪瓦政府期望通过自主性措施和机制摆脱国际社会的控制；^② 另一方面，由于瓦塔拉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其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受西方影响较为深刻，期待依靠国际社会的支持来汲取政权外部合法性。

国际组织参与冲突后重建进程为科特迪瓦政府提供了财政和技术支持，但同时输出以经济上自由主义和政治上多党选举为原则的“自由式和平”理念。^③ 该理念在非洲的应用不仅缺乏一定的适用性，而且限制了当地政府和民众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通过调研来解决冲突根源的意愿和能力。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加重了对外部市场的依附性，使科特迪瓦难以摆脱国际市场上的边缘地位。2016年初，可可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下降，直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对科特迪瓦经济的韧性造成挑战。^④ 另外，可可生产的大部分产品附加值尚未在本土实现，本国民众没能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获益者。作为全球第一大可可生产国，科特迪瓦满足国际市场40%的可可供应，但是只享有5%~7%的收益。^⑤ 政治上，以争夺现代政治经济资源为目标的多党选举一直是科特迪瓦历史上的高危时刻，冲突爆发与总统选举几乎同频。2020年10月总统大选引发的社会动荡再次验证了科特迪瓦政治斗争

- ① 例如，联合国科特迪瓦特派团民事部推行“快速效应项目”(Quick Impact Projects, QIP)。该项目旨在满足民众在生活用水、教育等方面的迫切需求，并通过促进社群间对话实现社会融合。同时，世界银行也着手以社群为中心推动当地发展。
- ② 例如，瓦塔拉政府出台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紧急总统项目”，通过该项目提高财政支配自主性。然而，国际组织对该项目的透明性和运行机制提出质疑，试图干涉项目管理。Francis Akindès, «On ne mange pas les ponts et le goudron: les sentiers sinueux d'une sortie de crise en Côte d'Ivoire», *Politique africaine*, 2017, No. 148, pp. 5-26.
- ③ Pugh Michael, "Reflections on Aggressive Peace,"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XIX, No. 4, 2012, pp. 410-425.
- ④ Hélène Ehrhart, «Une croissance ivoirienne dynamique: chiffres et défis», *Afrique contemporaine*, 2017, Vol. 3, No. 263-264, pp. 218-220.
- ⑤ «Au pays du cacao, comment transformer la Côte d'Ivoire» [En ligne], *Rapport de la Banque mondiale*, juillet 2019,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277191561741906355/pdf/Cote-dIvoire-Economic-Update.pdf> [2020-03-26].

与社会冲突的关联性和复杂性。如何跳出政治权力争夺、解决国家和社会运转中的根本问题，仍是当今科特迪瓦面临的重大挑战。

结 语

科特迪瓦冲突的根源错综复杂，是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通过族群、地域等身份符号爆发，并在争夺现代政治经济资源（统治权、土地等）过程中被激化的结果。因此，民族和解应突破社群关系的修复工作，其着力点应是多重的，既包括使每个公民重获尊重、重塑社群之间的关系，也涉及重新分配权利和资源、重整政治司法体系、重建共同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等方面。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合理分配，如何在吸引国际合作和援助的同时塑造内生合法性，如何在现代国族概念的架构下重塑社会共生的纽带等结构性问题仍有待科特迪瓦政府破解。上中下层的民族和解推动着科特迪瓦社会融合的实现，但仍面临诸多问题。政治领导人因聚焦权力斗争而忽视民众诉求，民族和解机构由于内部机制问题难以发挥作用，草根非政府组织因力量弱小且分散而自主性日渐削弱。瓦塔拉总统 2020 年 12 月就职后表示将成立民族和解部，致力于促进政治对话、弥合社会裂痕。然而，其措施能否成为解决民族和解问题的可持续方案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责任编辑：章 波）

African Studi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 and the China – Africa Institute (Beijing 100101) .

Morocco’ s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 under the Strategy of Diplomatic Diversification

Zhang Yuyou

Abstract: After the upheaval in Middle East in 2010, Morocco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diversification in its diplomatic policies, which is to establish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politics, econo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and other fields with emerging countries on the basis of maintaining traditional allies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Morocco has taken full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out by China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going global”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actively advance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upgrade of Morocco’ s relations with China has gone through stages from contacts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and friendly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to strategic partnership.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two sides, Morocco has embarked on a diplomatic strategy to China dominated by the royal family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government, political parties and non –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covering such paths as royal visits, signing of agreements, political consultation, exchange of experience in governance and exploration of a tripartite cooperation model. The two countries have made great strides in political cooperation, bilateral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Chin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Morocco’ s strategy of diplomatic diversification.

Key Words: Morocco, strategy of diplomatic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emerging economies

Author: Zhang Yuyou,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 an 710069) .

Reflections o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in Cote d’ Ivoire

Meng Jin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the electoral crisis in 2010 – 2011,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began in Cote d'Ivoire. Histor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elements explain the long-term politico-military crisis. The unsustainable plantation economy leads to inequalities in social relations. Economic growth and authoritarian rule under Houphouët-Boigny temporarily curbed the outbreak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post-Houphouët-Boigny era, social conflicts intensified and divided the society of Cote d'Ivoire. Political leaders, state institutions,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actors engage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Due to political position and personal interests,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face many obstacles and difficulties. The policy of promoting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through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Alassane Ouattara has been difficult to bridge the social chasm caused by years of conflict. Only by breaking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level of reconciliation, implementing structural reforms and building a unified identity can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be truly achieved.

Keywords: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plantation economy, ethnic conflict, Dialogu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Author: Meng Ji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West-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and the China-Africa Institute (Beijing 100101).

Building and Politicization of Ethnic Identity in Kenya

Li Jia

Abstract: The ethnic group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ny African countries, and Kenya is one of the countries where ethnic identities are most salient. Similar to many African countries, the emergence of ethnic identity in Kenya is closely related to colonial rule.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identity is not only caused by colonial history but also the result of Kenyan responses to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nvironment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independence, the manipulation and use of ethnic identity by political elites resulted in the strengthening of exclusive ethnic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ethnic identity. After democratization, the